



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与对策

一、南京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现状

(一) 利用外资量质双升

近年来,南京利用外资量质双升。2021年南京实际使用外资50.1亿美元,总量达到历史新高。投资结构优化,在为外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大空间、更优环境的同时,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地标产业重大项目招引导向,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在开放发展大势中实现合作共赢。LG新能源、福特研发中心等一批龙头大项目相继增资、投产。外资总部集聚,累计获批省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功能性机构52家。截至2021年12月,共有111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宁投资设立法人企业及分支机构共计225家。

2022年1—6月,全市新增实际使用外资35.3亿美元,同比增长14%。全市新设及增资外资项目343个,合同利用外资61.3亿美元。整体呈现合同外资规模持续增长、服务业吸收外资保持较高水平、制造业及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持续增长,以及香港地区直接投资占比较高等特点。

(二) 对外贸易实现反弹

外贸规模不断扩大,2021年南京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985.3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一般贸易进出口和民营企业全市占比分别达到近80%和40%。新业态蓬勃发展,2021年度获评省内唯一的商务部跨境电商综试区全国“十佳”城市。

服贸试点卓有成效,自2016年2月以来南京开展了三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6条试点经验和3条实践案例被国务院通报并向全国复制推广,5个特色载体入选国家级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总数位居全省第一。服务外包全国领先,2018—2020年在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评价连续三年位列全国第二。

2022年以来,受国际局势紧张、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等多重因素影响,南京外贸承压前行,出口业务持续受创,稳外贸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困难重重的“逆风局”,南京及时挥出稳外贸“组合拳”,帮助企业保订单、拓市场、畅通道、增信心。5月、6月,外贸进出口迎来强劲反弹,单月同比增幅分别实现10.1%、17.7%。2022年1—6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464.5亿美元,同比增长3.0%。其中,出口278.1亿美元,进口186.4亿美元。

面对外需增长乏力的困难挑战,南京充分发挥全国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国家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优势,加快外贸转型发展,开创“跨境电商+产业带”新模式,构筑外贸竞争新优势。截至目前,南京共培育省市跨境电商产业园5个,省市跨境电商公共海外仓20个,分布于11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国4000余家外贸和供应链企业。拥有19家跨境电商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形成一批集孵化、研发、运营、客服、设计等于一体的综合配套服务载体,开展跨境电商业务企业超千家,2021年新认定的跨境电商产业园、公共海外仓数量居全省首位。根据商务监测数据,南京跨境电商2021年累计进出口313.76亿元,同比增长52.58%,外贸新业态发展走在全省前列。

从企业集聚到产业集群,从服务平台到示范基地,南京聚焦数字技术、数字金融、数字文化、跨境电商等特色领域,在重点载体平台建设方面明确“发力点”,不断完善数字贸易产业链条,积极构筑数字贸易发展“新高地”。2022年上半年,南京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56.75亿美元,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24.55亿美元,全省占比约四成。一是服务贸易先行先试。南京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规模稳步增长,质量结构持续提升,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已拥有5个国家级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二是数字出海买卖全球。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数字贸易新业态,以希音、网觉、未迟为代表的数字服务企业,为国内企业在海外建设运营独立站和海外仓、开展数字营销。三是构建发展平台载体。立足南京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优势,努力打造数字贸易关键技术密集地、优势企业云集地、创新要素汇集地和制度创新策源地,全市已有服务贸易相关公共服务平台近70个。

(三) 抢抓 RCEP 机遇取得初步成效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南京的贸易“朋友圈”迎



来新的发展机遇。2022年1月1日,江苏博汉工贸有限公司申请签发了南京市第一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原产地证书。2022年上半年,南京对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总值1127.5亿元,同比增长3.7%。全市共有270家企业办理RCEP原产地证书3957份,预计可享关税优惠约1334万元。

以贸易便利化为突破口,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南京市搭建惠企服务平台,全国首创RCEP等多个国际自贸协定合一的“FTA惠企‘一键通’”智慧平台,实现关税优惠、原产地规则、自贸政策等一键知晓,目前已有近6000家企业注册使用该平台,点击量近10万次。引导企业扩大电气设备、汽车零部件等降税商品出口,加大机电产品、矿产品等降税商品进口。同时,鼓励企业深挖对RCEP国家的进口需求,搭建了面向日韩、澳大利亚的进口消费品直销平台。2022年上半年,全市对RCEP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平均增速1.6个百分点,其中对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等国进出口增长明显加快。积极开拓RCEP开放通道,推动南京—万象的中老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营,上半年南京至老挝发车量超去年全年4倍。加密直达日本、韩国的近洋航线,每周运行9班直达货轮。

以投资和产业链重塑为动力源,不断强化项目支撑。加强RCEP区域外资招引,2022年上半年,RCEP成员国在宁累计新设33个项目,实际使用外资4.2亿美元,同比增长123.3%。支持RCEP区域跨国公司在宁设立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目前已有韩国、新加坡等RCEP成员国在南京设立了3家经认定的功能性机构。不断提升区域境外投资和工程承包跨境资源整合能力,仅上半年,南京企业赴日本、新加坡等RCEP国家境外投资备案项目8个,中方协议投资额1500万美元,同比增长23%,对外承包工程在RCEP成员国累计营业额4.5亿美元,占全市的42.8%。

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点,不断完善政策举措。出台深化制度型开放应用场景试点方案,聚焦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要素便捷流动和“边界后”规则等领域,针对货物通关、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数据跨境流动、绿色低碳贸易等具体应用场景,提出20条对标举措,先行开展试点和压力测试,努力形成制度型开放的经验成果。在全省率先发布《数字贸易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5年)》,全市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等国家级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数量占全省一半以上。

(四) 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新进展

2021年12月8日,江苏首开中老铁路(南京—万象)国际货运列车,着力推进境外线路精品化、多元化布局,为本地企业打通新的对外贸易通道、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这也是长三角开行的首趟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

中老铁路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南京抓住 RCEP 协定正式生效契机,克服重重困难,稳定开行中老方向国际货运列车。作为联通南京与东南亚国家贸易往来的“陆上新通道”,该国际货运列车积极服务中粮、苏美达、舜天、国泰等多家企业,打通了覆盖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的门到门多式联运物流通道;2022 年上半年,南京至老挝已发 11 列 442 车,稳居东部地区首位,开行规模和市场影响仅次于云南。

南京地处“一带一路”交汇点,也是京沪铁路与长江深水航道的交汇点,拥有繁密纵横的高速公路网,是畅通四海的“水陆空”交通枢纽。2022 年上半年,面对国际局势紧张、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等不利影响,海运“一柜难求”,运费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凭借效率高、路线广、全天候等独特优势,成为联通亚欧大陆的重要贸易通道。上半年累计开行 186 列 7651 车,完成全年开行任务的 71.5%,同比增长 137.68%。

2022 年 7 月 13 日,江苏远洋“远诚”轮在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 801 泊位缓缓驶离,标志着“南京—太仓—海防—胡志明”东南亚集装箱外贸航线正式开通。航线每周一班,从南京到越南海防仅需 5 天,7 天就可抵达胡志明市,有效解决了南京及周边区域面向越南、泰国等主要贸易区域直航舱位不足的短板,为企业搭建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大通道。

(五) 境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稳步推进

支持企业“走出去”,是南京发展开放型经济、推进国际化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发展,南京企业“走出去”的足迹遍布全球六大洲,投资合作覆盖 122 个国家和地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南京市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更好服务全省“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和国家开放发展大局。

2022 年 1—6 月,全市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2.97 亿美元,同比下降 5%。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 10.5 亿美元,新签合同额 6.9 亿美元。

(六) 开放载体建设亮点突出

2022 年 1—6 月,全市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90.6 亿元,同比下降 16.8%。固定资产投资 1354.5 亿元,同比增长 14.6%。实际使用外资 14.4 亿美元,外贸进出口额 1319.8 亿元。

南京市两大国家级开发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及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均建立并完善了网格化联系企业机制,由点位长、驻厂员、专班配套负责人员组成帮扶小队,一企一档,密切走访重点企业,对企业诉求逐一分析,找准症结、锚定目标,区分优先级,对于重点企业,每日安排专人对接企业解决情况。南京经开区 2022



年上半年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1770 亿元,同比增长 8.9%;上半年实际利用外资超 5.47 亿美元,完成全年目标 74.5%。在 5 月份江苏省外资项目“云签约”暨外资总部企业“云授牌”会场上,签约 3 个外资项目,总投资近 30 亿元。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是南京开放型经济的“金字招牌”,肩负着为国家推进高水平开放探路的重大使命。南京市充分发挥国家级江北新区和自贸区南京片区“双区”叠加优势,深化制度型开放,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碳排放等领域创新探索、先行先试,构筑南京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改革创新的“策源地”。南京片区设立三年来,已累计形成 150 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 4 项、31 项和 33 项成果分别在全国、全省和全市复制推广。推出开放领域 20 项应用场景试点措施,开展 QFLP、QDLP 试点促进资金双向跨境流动,成立全国首个专注研究 DEPA 等数字贸易规则的扬子江国际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研究院。

跨境电商企业对流动资金的依赖性较高,过去企业出口海外仓商品,要在离境销售并实际收汇后才能申请出口退税,周期较长。中国(江苏)自贸试验区南京片区在全国首创“海外仓离境融”服务平台,基于海关、税务的企业评级等社会征信体系,通过数据模型对企业经营质量、风险状况、信用资质进行综合评估,为企业融资提供精准“画像”。

二、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形势分析

(一) 不确定性因素深刻影响全球资本流动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 年全球性流动性明显不足,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从 2019 年 1.5 万亿美元降至约 1 万亿美元,降幅高达 35%,创下 2005 年以来的历史新低。疫情通过需求负面冲击和全球供应链中断减缓了现有投资项目的进度,带来的不确定性抑制新的国际投资计划。2021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虽然实现反弹,增长到约 1.65 万亿美元,但投资者对工业和全球价值链的信心依然不足。预计 2022 年全球外国投资难以再实现快速增长,供应链瓶颈、能源价格波动和通胀压力是影响全球资本流动的主要风险,国际产业链重构呈现近岸化、本土化、区域化特点,各国引资竞争愈演愈烈,南京吸引外资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严峻。同时,一些经济上对外较为依赖的国家开始反思各自的产业政策,以减少对外部世界的过度依赖。这很可能导致当前疫情带来的经贸依存度下降以及全球供应链“去外国化”成为长期趋势。“价值观外交”向“价值观贸易”“价值观投资”加速演变。2022 年,美国将出台多部法案加快促进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回流,并对华展开产品、行业的定向脱钩。同时,欧盟供应链尽职法案、碳边境调节机制加快立法进程,

在供应链政策中加强对人权、气候变化等议题的管控,增强供应链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属性,从而推动供应链局部脱钩。一些跨国公司通过转移或回流缩短生产长度、减少参与生产过程的国家数量,降低全球供应链的网络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从而实现生产网络重组。

(二) 逆全球化思潮持续抬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逆全球化思潮之所以抬头,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发达国家感到在全球化进程中力量对比出现变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借助全球化所提供的机会和平台,对国内经济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整,实现了经济腾飞,并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中国迅速崛起,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打乱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原有秩序。欧美发达国家感到东西方力量对比出现变化,为保持其主导地位,力图通过保护主义等方式重新确立其竞争优势,保持在未来全球产业和经济发展中的游戏规则制定者的地位。

第二,西方国家内部发展失衡却在外部寻找原因和出路。从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趋势看,其产业结构已呈现明显的“服务化”态势,特别是美国,“金融化”和“去工业化”使资本主义的利润来源与形式发生了变化,金融资本日益扩张,制造业则逐步衰落。占有财富和资源的上等阶层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劳动者阶层却没能从中获益,由此造成了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两极分化现象。为缓解国内的矛盾与困境,发达国家政府将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归咎于全球化,指责发展中国家夺走了其工业和就业机会。受这种舆论环境的引导,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受损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会支持政府采取“逆全球化”的举措,反对更多地融入全球经济中,从而导致了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问题的“国内化”。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没有跟上全球化的步伐,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制度缺陷。由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多边治理体系经受重大挑战,全球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在WTO现代化改革方面,各方对规则谈判的优先领域和内容、争端解决机制和发展中成员地位等问题仍存在较大分歧;在IMF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方面,各成员的份额和投票权分配远未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在联合国改革方面,安理会、振兴大会、经济社会理事会以及维持和平行动等领域工作的推进还面临很多压力和挑战,各成员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仍难以调和。不论是世界贸易组织还是对其他国际关系进行协调的国际组织与协定,对成员国



来说都缺乏明确的约束力,对合则用、不合则退的实用主义束手无策,一方面导致全球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常常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也损害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权威和声誉。深度的全球化、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族国家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从而削弱它应对全球化副作用的能力。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下,更有利于垄断资本在全球配置并获得超额利润,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更为明显。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差距拉大,更表现在发达国家内部。

(三) 国内区域竞争加剧

一方面,各地进一步出台政策加强对优质外资项目的争夺,例如福建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利用外资保稳促优若干措施的通知》,对新设(含增资)制造业外资项目外方实际到资 1000 万美元及以上,由省级财政按到资金额 1.5% 给予最高 1000 万元奖励,引导和鼓励外资更多投向制造业。另一方面,现有制造业外资企业出于土地、人工、物流等成本的考虑,加快空间布局重构。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开发区等平台载体发展迅速,对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吸引力逐步增强。从服务业利用外资来看,扩大开放综合试点“1+4”格局(即北京+天津、上海、海南、重庆)对稳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 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9064.9 亿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为 78.9%,其中,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地区服务业引资占全国的 33.4%。2022 年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预计将再次扩围,各地竞争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三、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 促进外资企业与南京经济深度融合,加强供应链风险管理,提升外资企业的根植性

不少愿意长期扎根的外资企业已经在加快本土化进程,南京要积极顺应这一趋势,加强外资企业与南京经济的融合,特别是推进本地化采购和研发。促进外资企业与南京内资企业的产业合作,逐步从代工生产合作模式向高附加值新兴产业合作模式转变,瞄准外资企业上下游积极培育国内的供应商,充分发挥我国产业链齐全、江苏制造业发达的优势,加快供应链合作、项目合作和产业链融合,减轻外资企业对外依存度。发挥外资“灯塔工厂”的示范引领作用,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经验延伸到产业链和供应链。

支持外资企业通过供应链风险管理来加强其生产网络抵御冲击的能力。定期评估安全库存水平,建立战略储备,并提高获取运输和物流替代方案的能力,推动生产运营模式从“准时制”转变为“以防万一”。

支持外资研发机构与南京本土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合作共建实验室,联合开展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参与建设研发转化平台、专业孵化器。鼓励和引导南京企业与外资研发机构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开展技术配套。推动创新研发人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合作交流,定期举办学术沙龙、创新论坛等活动吸引中外研发机构参与。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参与南京科技创新项目,将他们纳入南京本土的科研与创新体系当中,对与本土企业、研发机构或高校合作的科技项目优先支持。加快科技创新开放步伐,推动外资企业在南京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中心,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研发中心。

(二) 在加强精准招商的同时,支持存量外资企业增资扩股

依托产业集群对行业领军外资企业进行招商,吸引行业外资领军项目入驻以“固链”,依托重点产业链进行关键节点招商,吸引在零部件、中间品等细分领域“隐形冠军”类优质外资项目入驻以“补链”,消除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国际“断点”。围绕南京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全产业链外资招商,吸引高技术外资项目以“强链、扩链”。

加强对外资企业增资扩股的引导。充分认识到外资企业增资扩股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效果最好的招商方式,对增资扩股工作加大考核权重。外资企业未分配利润再投资已成为外资到位的一块重要数据,在各类奖励优惠政策中除新设外也将增资纳入进来。

(三) 以平台建设形成发挥开放创新机制的重要载体

强化重点合作平台载体建设是开发区构建开放创新长效合作机制的重要抓手。要按照优势互补原则,聚焦重点国家、重点领域和重点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技术转移中心等长效稳定、影响力大、吸引力强的战略支点,健全功能,完善布局,打通关键通道,以点带线,以点带片,逐步构建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创新骨干网络,促进持久、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发挥聚集、引领、辐射、带动作用,把创新体系扩展至全球层面,助力更多的开发区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和市场。同时,加强各类开放创新合作平台的横向协作和经验交流,促进提升整体效能。

一是着力强化技术转移中心和协作网络。充分发挥南京区位优势和发展特色,与重点国家和地区加强技术转移中心和协作网络共建工作,优化布局,提升功能,疏通技术资源对接渠道,充分发挥窗口、辐射、带动作用,挖掘企业合作需求,促进科技成果双向转移转化。

二是着力推进科技园区建设。培育一批集国际化“双创空间”设置、科技企业孵化、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产品输出、研发及产业化对接、人才交流等功能于一体,有



利于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园区,发挥聚集辐射效应。以高新区、科技园及企业为主体,协助“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科技园区建设,重点推进科技园“走出去”,既向沿线国家提供科技园发展经验,也在国外为企业搭建全方位服务平台,帮助南京开发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消除“走出去”疑虑,解决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促进开放创新与互联网加快融合,尤其注重发挥小微科创主体的功能,形成国际化众创平台。为企业、科研机构提供信息技术支持,打造网上在线对接互动系统、“云”平台,纵深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的国际科技合作工作。

(四) 进一步加快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的先行先试步伐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短期内对国际经贸交流与合作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从长期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能逆转。中国设立自贸试验区,目的就在于探索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对外开放的路径,测试扩大开放的压力所在,通过设立开放试验窗口,适度引入外部市场压力倒逼国内改革。因此,应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开放测试平台的作用,把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相结合,使创新动力与竞争压力相呼应。一方面持续扩大开放,推动境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引入外部的竞争理念和竞争压力,帮助境内企业树立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主动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创新,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正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激情,提升企业自我改革的勇气和信心。

一方面要推动南京企业主动对标高标准的国际规则来深化改革。逐步将“竞争中立”原则应用于各类型企业,从资源配置到绩效激励各个层面都贴近市场,形成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对市场怀有敬畏之心的氛围。另一方面要努力打造并充分运用对外开放合作的平台,助力南京企业进一步熟悉并适应国际规则,用国际先进标准引导自身转型升级的战略安排。应当抓紧时机,开展有关环保、劳工等高标准规则或应对高标准规则的探索,为我国争取规则制定的国际话语权提供实践经验。

(五) 建设境外经济合作区,培育壮大跨境产业链

进一步推动南京优势制造业“走出去”,到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建设生产线。延伸拓展境外产业链,加快构建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于一体的跨境产业链体系,推动国际优质资源要素的优化整合。鼓励企业设立境外研发机构、设计中心和高新技术企业,进一步增强自主研发设计创新能力。支持企业在境外设立销售公司、展示中心、售后服务等营销服务平台,加快构建国际化、专业化、本土化的营销服务体系。探索升级境外合作园区“重资

产投资运营”和“轻资产管理输出”发展模式，主动对接国家规划，加快规划建设“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园区、境外经贸合作区。

要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遵循互利共赢的思路，既考虑南京企业开展产能合作的需要，又充分考虑东道国的发展诉求。在推动产业发展时，照顾相关国家的基本国情、发展规划与战略目标、产业发展与区域布局，通过促进相关国家要素集聚和产业集聚，真正服务于相关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选择合作对象时，综合考虑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与贸易投资发展情况，以及相关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政治局势、经济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市场需求的现状和前景，优先选择与我国经贸往来密切、双边关系良好的国家拓展业务。在重点合作领域选择上，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选择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的领域切入。

要充分发挥南京在园区规划、建设、运营等领域经验丰富、企业实力强、产业链条完整的优势，实施“多元主体，抱团出海”的战略，推动企业之间紧密配合，形成有机整体，实现“1+1>2”的协同效应。一方面，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抱团。上游原材料供应、中游生产与建设、下游分销企业要抱团形成全产业链相互配合的团队，在东道国形成产业集群效应。避免单个企业独立嵌入国外产业链的特定环节导致缺乏上下游配套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要与海外投资生态圈中的企业抱团。要跨越制造业单一环节，在上中下游有机结合的同时，与金融、会计、法律、咨询等行业之间有机整合，形成生态圈。通过建立“金融+产业+服务”模式，破解海外园区发展面临的各种困难与风险。

（六）引导企业按照国际惯例和市场原则谨慎开展跨国并购

南京企业在进行境外并购的过程中应明确自身战略定位，认真评估慎重选择目标企业。对于审查严格的欧美国家，要尽量避免核心技术、重要基础设施、能源、国防、航空航天、网络安全等领域。妥善选择交易目标，明确公司的治理结构，强调投资的商业目的，尽可能将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或资产与交易目标相剥离。敦促企业在交易项目过程中尽早聘请专业团队，构建合适的交易结构，将受到审查的可能性和影响最小化。还可以根据情况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借助他们的运作经验和战略资源，消除并购障碍。并购时采取相对灵活、迂回的策略，循序渐进，不冒进，保持低调，不要急于求成。从小的标的、少数股权投资开始，最好先进行绿地投资，要尽量减少对知名的、规模较大的高科技企业的一次性完整收购，既减少欧美国家政府和大众对中国企业突然冒进的陌生感以及企业自身的资金压力，也规避了中外企业合并中经常出现的诸多冲突和操作风险。



要更加注重并购后整合,实现并购价值的提升。对于高科技领域的并购而言,完成并购程序才是第一步。并购的价值主要是由并购交易之后的整合带来的,而非来自更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并购交易具体实施阶段。一部分在当时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并购交易,后续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业务无法产生协同、人才流失等原因最终未能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并购整合能力成为决定并购效果的关键因素。企业境外并购的回报显然不止来源于目标企业现有的技术和产品,更重要的是留住那些能够研发这种技术和产品的人才。如果由于整合不力而失去开发技术和产品的核心人才,这就相当于只获取了第一代技术,而失去了第二代、第三代等未来技术。人才具有稀缺性和难以替代性,并购是快速获取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能够帮助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完整的研发团队,大幅降低获取人才的时间和成本,同时企业在并购后规模扩大、实力增强,还会吸引更多人才加入,为企业带来更多技术创新要素,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因此人力资本在高科技领域并购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购交易实现交割不是并购的结束,通过整合实现并购的预期目标才是并购的真正意义所在,未来企业的并购整合能力将在高科技领域并购中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此外,更好地完成并购后的整合将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有利于南京企业在东道国以及其他国家树立良好的形象,既为南京其他企业的境外并购增添信心,也有助于消除东道国政府和民众的误解,减少投资障碍。

作者:徐清(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